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三大战略比较研究

程保平

摘要: 从完整的意义上看, 中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上先后实施了均衡、倾斜和西部大开发等三种不同的战略。区域经济均衡和倾斜发展战略, 由于作为其实施基础的制度设置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存在内在冲突, 故而前者导致了区域共同贫困, 后者导致了区域两极分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真实意图是要实现市场空间结构的创新, 培育区域共同富裕机制, 因此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选择。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 区域空间结构

一、引言

根据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中国区域经济良性运行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落后的内地之间的共同富裕问题。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就是国家为了谋求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共同富裕进行的总体性策划。为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政府先后实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三, 即 1950—1978 年期间实施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 1979—1999 年期间实施的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和 2000 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此值得说明的是, “八五”时期虽然提出了有别于区域经济倾斜发展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概念, 但在 1995 年前的具体执行中, 仍然是以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为主体的。1995 年尽管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并且加快了黄河流域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开发, 但从总体上看, 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的思路, 加上时间较短, 因而不能看成是一种完整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现在的问题是, 既然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都是为了谋求区域共同富裕, 那么它们之间为什么会形成替代呢?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 被替代的战略并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又为什么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呢? 西部大开发战略又怎样才能完成区域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呢? 显而易见, 对区域经济发展三大战略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 其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言自明。

二、逻辑分析框架

区域共同富裕作为区域经济运行及其发展的结果, 属于区域经济绩效范畴。从理论上讲, 区域经济绩效从根本上取决于区域机制, 有什么样的区域机制, 就有什么样的区域绩效。区域机制又从根本上取决于区域空间结构, 有什么样的区域空间结构, 就有什么样的区域机制。所谓区域空间结构, 是不同区域的制度安排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区域空间结构不同, 区域机制则不同; 区域机制不同, 区域绩效也不同。反过来也一样。在区域经济的实际运行中, 区域空间结构、区域机制及其区域绩效, 三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理论上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在时空中可以分开且存在先后顺序的逻辑递进关系, 即“区域空间结构→区域机制→区域绩效”。

根据不同区域的制度安排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情况, 区域空间结构可以划分为计划空间结构、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和市场空间一元结构等三种基本类型。计划空间结构指的是不

同区域的计划体制在空间分布上同时并存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市场空间二元结构指的是发达的区域市场和落后的区域市场在空间分布上的同时并存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指的是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不同区域市场在空间上的同时并存状态及其相互关系。

区域空间结构的三种基本类型, 决定了区域机制也具有三种基本类型, 即区域共同贫困机制、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和区域共同富裕机制。至于哪一种区域空间结构内含着哪一种区域机制, 本文将在第三、四、五节中分别予以研究。

区域机制的三种基本类型, 决定了区域绩效也有三种基本表现形式, 即区域共同贫困绩效、区域两极分化绩效和区域共同富裕绩效。显然, 区域共同贫困机制必然表现为区域共同贫困绩效; 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必然表现为区域两极分化绩效; 区域共同富裕机制必然表现为区域共同富裕绩效。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说的区域共同富裕绩效, 又可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区分出三种层次, 即温饱型共同富裕绩效、小康型共同富裕绩效和发达型共同富裕绩效, 并且依次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发达阶段相对应。高一级的区域共同富裕绩效的实现有赖于低一级区域共同富裕绩效的实现。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所涵盖的区域共同富裕绩效, 从字面上解读相当于本文概括的发达型共同富裕绩效, 在实质上则包括了本文所说的各种层次的区域共同富裕绩效。因为区域共同富裕绩效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 不应该只是体现在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中级阶段, 同时也应该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及初级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如果否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初级阶段不同历史时期还存在着相应的区域共同富裕绩效, 那么此时的社会主义本质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初级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还叫不叫社会主义呢? 改革开放以来, 理论界之所以有不少学者热衷于区域两极分化, 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区域共同富裕绩效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 体现于社会主义的一切历史发展阶段, 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始终; 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区域共同富裕绩效实际上具有高低层次上的差别。当然, 我们把区域共同富裕绩效划分出若干层次, 并非宣扬平均主义。在每一层次的区域共同富裕绩效中, 都存在着富裕程度上的差别。例如, 在温饱型共同富裕绩效中, 有的区域的温饱程度可能更大一些, 有的区域可能更小一些, 如此等等。

构建“区域空间结构→区域机制→区域绩效”这一逻辑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 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绩效, 根源于这些战略所培育或者所依赖的区域空间结构。据此就能够合理地说明, 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之所以出现替代的基本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异。

三、计划空间结构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一) 计划空间结构→区域共同贫困机制→区域共同贫困绩效

艾登姆和威奥(1978)认为,计划经济体制要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计划机构(无论是中央政府的还是地方政府的)必须对其所辖的一切经济活动,诸如物资资源、人力状况、技术可能性、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等等拥有全部真实的信息,即所谓完全信息前提。其二,全社会(无论是从全国意义上看还是从各个区域意义上看)利益一体化,不存在具有利益差别的主体和相异的价值判断,即所谓单一利益主体前提。言下之意是,若不同时具备这两个前提,计划经济体制就会由于计算不可能准确无误和计划不可能得到严格精确执行,难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状态。计划空间结构条件下,上述两个前提不可能具备。从信息机制方面而言,无论是区域内部还是区域之间,均缺乏应有的横向联系和有效的反馈手段,经济信息是通过行政体系内部上级对下级的行政指令或者下级对上级的的工作计划等形式进行纵向传输的。这种传输渠道不仅导致信息传输距离过长、传输通道狭窄等问题,而且还会由于传输中介环节过多,不可避免地产生信息阻滞、失真或扭曲。在区域计划机构掌握和处理各种微观事务的情况下,获得保证经济系统通畅运行信息的种种努力,会因交易成本趋于无穷大而缺乏可行性。从利益主体方面而言,区域与区域之间,甚至区域内部的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并非是一种全同关系。撇开计划编制的复杂性和计划指标的可行性不论,即使是在计划编制和执行的各个环节上,都会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或矛盾,例如“条块分割”问题;例如生产计划、投资计划、物资供应计划和综合财政计划之间的协调问题等,都折射出相关的利益冲突或矛盾。“社会鲁宾逊肢体”既不存在于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中,也不存在于区域内部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中。因此,计划空间结构由于并不具备完全信息前提和单一利益主体前提,内含着区域共同贫困机制,即各个区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低效率或无效率机制。在区域共同贫困机制作用下,使得既定的投入要素规模往往达不到应有的经济增长总量。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在投入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呈绝对下降趋势,在投入要素规模扩大的条件下呈相对下降趋势。无论是绝对下降还是相对下降,都不过是计划空间结构条件下区域共同贫困机制的必然表现形式。

计划空间结构条件下,区域共同贫困机制不仅使得区域经济增长在总量上表现出收缩性,而且还使得区域经济增长在方式上表现出粗放性。我们知道,区域经济增长总量是经济体制、技术水平和投入要素规模的函数。在这一函数的三个自变量中,计划空间结构装置至多只能达到巴罗尼(1908)所说的“技术性”平衡,但绝对不可能达到经济学上的最优状态,这本身就包含着区域共同贫困机制。技术水平则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装置以及经济利益的内在驱动,在时间序列中的变化率或进步率趋于无穷小,不可能对区域经济增长总量产生实质性的催化作用。唯一能对区域经济增长总量起到增长作用的是投入要素规模的扩张。这样,在计划空间结构装置低效和技术水平进步率趋于无穷小的约束中,区域愈是想提高经济增长总量,就愈是要扩大投入要素规模,就愈是要进行粗放式经营。

由上述分析可见,计划空间结构条件下,内含着区域共同贫困机制,并以区域经济增长总量收缩和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经营等形式表现出区域共同贫困绩效,即“计划空间结构→区域共同贫困机制→区域共同贫困绩效”。因此,在计划空间结构条件下,各区域倾向于共同贫困而不是共同富裕。

(二) 计划空间结构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所谓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是指以内地为发展重点,试

图以此求得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共同富裕的总体性筹划。1950—1978年期间,在政府的相关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范畴,但这并不否定国家在此期间事实上实施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是极具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征的区域经济严重失衡的格局。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77%以上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占国土面积88%以上的广大内地,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22.4%。尤其是西部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国土面积占全国45%的西北和内蒙古,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3%;国土面积占全国23%的西南地区,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国的6%。区域经济严重失衡的空间格局,对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未来区域经济运行都极为不利。为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国家集中力量对上海、辽宁等沿海工业基地进行恢复改造的同时,开始把一些沿海工业企业内迁到东北北部、西北、华北和华东的某些地区,并在山西、陕西等地新建机械制造工业和棉纺织工业,在新疆发展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采矿业。在国家重点扶持下,内地开始了现代工业的起步阶段。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在此期间,内地工业总产值由40亿元增加到100.1亿元,增长1.5倍。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国家在加强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和其他基地建设的同时,还重点抓了以武钢为中心的华中工业基地和以包钢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基地建设,在西南、西北也开始了部分工业建设。在此期间动工兴建的限额以上的694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有472个分布在内地,占总额的68%。包括工业在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内地占46.8%,沿海地区占36.9%。在内地建设中,80%以上的资金投放在湖北、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河南、黑龙江、吉林和四川(含重庆)等9个省区,集中建设了武汉、包头、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哈尔滨、长春、吉林和成都等主要工业基地。在此期间,内地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0.5%,比沿海地区高3.7个百分点。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30.6%提高到34.1%。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国家除继续进行武钢、包钢等基地建设外,同时积极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周围地区以钢铁、有色金属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基地建设;继续进行新疆地区的石油、有色金属工业建设等。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国家在充实和发展华北、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内地工业建设。从1964年起,钢铁工业投资的重点转向内地。在大力建设攀枝花钢铁公司的同时,新建和扩建了成都无缝钢管厂、西宁钢厂、陕西钢厂和贵州钢铁厂等。在西北、西南和华东地区新建煤炭工业,在武汉、湘潭、开封、洛阳、郑州、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等建立了十多个新的机械工业基地。这一时期,内地基本建设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到58.3%。内地与沿海地区的投资之比由“一五”时期的1.27提高到1.67。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时期,国家转移到以备战为中心,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轨道上。“三五”时期,主要以西南为重点展开“三线”建设;“四五”时期,主要以“三西”(即豫西、鄂西、湘西)为重点展开“三线”建设。“四五”后期到“五五”(1976—1980年)初期,国家投资布局重点开始逐步向东部沿海地区移动。

由上述分析可见,1950—1978年是国家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5年为第一阶段,这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施得最为充分的阶段。1966—1976年为第二阶段,由于此阶段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尽管国家布局的重点仍然在内地,却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受重创的阶段。1976—1978年为第三阶段,是酝酿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替代的阶段。因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给人以虎头蛇尾之感。

实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是以计划空间结构为基础的,并且在一定的意义上强化了计划空间结构。尽管实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在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衡的区域经济格局等方面功不可没,但不可能推动区域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相反还导致了区域共同贫困。因此,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并非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选择。

四、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与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

(一)“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区域两极分化绩效”

莱迪亚德(1976)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可能性集表现出非凸性,那么竞争均衡就不存在,其资源配置就会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1993)认为,如果一家厂商或社会在它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以下进行生产,亦即它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凹向原点,其资源配置就可以被认为是低效率的。不妨令一国经济由A、B两区域构成,其中区域A市场发达,区域B市场落后。在这种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相比较而言,区域A的资源配置具有相对效率,其经济增长具有内在扩张机制。区域B的资源配置相对无效,其经济增长存在内在收缩机制。在区域市场动态运行过程中,对区域B而言,由于区域A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对效率,无疑会抬高本区域各种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降低机会成本的理性决策会诱导区域B中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高的投入要素不断流出,形成所谓“要素效益外溢”。在此情况下,区域B所拥有或可支配的投入要素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讲,都会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收缩机制粘合在一起,区域B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乘数式收缩。相反,对区域A而言,由于区域B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对无效,无疑会降低本区域各种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并对区域B各种投入要素产生巨大的诱惑力,不仅本区域的各种投入要素不可能流出,反而还会大量吸纳区域B的各种投入要素,形成所谓“要素效益内注”。在此情况下,区域A可拥有或可支配的投入要素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讲,都会更加充裕。更加充裕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扩张机制的联姻,区域A经济增长便会孕育出乘数式扩张。在投入要素的上述流出流入过程中,尽管区域A中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区域B中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但由于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两区域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对比关系不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化,故而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必然凹向原点。

生产可能性曲线的非凸性以及区域A经济增长乘数式扩张和区域B经济增长乘数式收缩,又从一个侧面说明区域A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A、B两区域的平均增长速度,区域A的“效率工资”便趋于下降,由此就可获得一种为区域B根本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累积竞争优势,同时进一步遏制区域B,使其在经济增长中不断累积起愈益恶化其自身的各种因素。区域A累积的竞争优势包括:(1)累积起吸引新兴产业布局的优势。区域A凭借其足够的市场实力,能够累积起强大的科技力量、便捷的交通和通讯联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协作条件、雄厚的资本和活跃的消费市场。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区域A对于新兴产业部门(例如电子电器、计算机、生物技术、高级材料等)的空间布局具有巨大磁力。(2)累积起资本分配的优势。区域A市场发达,经济繁荣,人才密集,必然成为政治权势的中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研究与开发经费、政府采购、国家投入、外埠资金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的分配。(3)累积起服务部门成长的优势。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A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依次兴起与替代,势必带动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部门,诸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居民服务业、技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等的兴起与发展。(4)累积起市场成长优势。随着上述各方面优势的不断累积,区域A的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产权市场、

信息市场等也会得到空间发展,并形成相对完备的市场体系。与此相反,区域B尽管由于“扩散效应”的作用较之以往有着某种程度的进化,但也正是在这种进化过程中不断累积起方方面面的竞争劣势。比如说累积起工业化进程的劣势。区域A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要求充分的初级产品供给,并会通过技术转让、对外投资和产品统购等形式,刺激区域B增加初级产品生产,把区域B置于工业化进程的附属地位,甚至排斥在外,使得区域B工业化进程总是远远落后于区域A。比如说累积起产业结构方面的劣势。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区域间的分工往往是垂直型分工。在这种分工格局中,随着区域A产业部门的“外溢”,一些淘汰或即将淘汰的产业部门将会转移到区域B,构成区域B举足轻重的产业基础,致使区域B产业结构水平及其转换,总是远远落后于区域A。再比如说区域B资本匮乏、人才奇缺、基础设施落后、观念陈旧、市场发育不良等等,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累积竞争劣势的具体表现。

区域A不断累积起竞争优势和区域B同时不断累积起竞争劣势,又表明区域A实际上取得了一种市场垄断势力,可以通过索取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占有尽可能多的市场利益。市场垄断势力的出现,一方面意味着区域A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另一方面意味着区域B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行事。区域间市场竞争的非规范性,又会导致(1)区域间不可能达到竞争均衡状态;(2)区域间资源配置方面不仅低效率,而且还会成为进一步强化这种低效率的手段;(3)由于可以通过操纵市场,稳定而长期地占有巨额垄断利润,区域A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动力将大大丧失。

综上所述,根据福利经济第一基本命题的反命题,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条件下,(1)区域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市场,亦即区域间不可能存在足够的市场;(2)区域间不可能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规则行事;(3)区域间不可能达到竞争均衡状态,因而存在着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并以经济增长乘数式扩张和乘数式收缩、累积竞争优势和累积竞争劣势等形式表现出区域两极分化绩效,即“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区域两极分化绩效”。因此,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条件下,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区域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

(二)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与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

所谓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是指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试图以此求得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共同富裕的总体性策划。如果说实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还只是以既定的计划空间结构为基础的话,那么实施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则是以构建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为出发点的。伴随着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不只是对东部沿海地区采取了资金倾斜、政策倾斜,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两种倾斜,让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得到了倾斜式发展。在短短的10多年内就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起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15个保税区、一大批沿江、沿边开放中心城市,引进了2300多亿美元的外资和26万多家外资或合资企业,东部沿海地区率先以市场形式构成了对外开放的格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内地由于市场落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先设想的“梯度推进”遇到了内地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短缺、科技水平低下、劳动力素质较差、观念陈旧,因而市场效益明显偏低等不利因素的制约而受挫,不仅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难以扩散到内地,反而内地原本就十分稀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资源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地区。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培育了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内含的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及其这一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区域两极分化绩效,不仅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扩大化趋势,且这种发展差距已经越过了警戒线,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损害

了内地自我发展能力,引起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疑惑。因此,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从总体上看同样不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选择。

五、市场空间一元结构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一)“市场空间一元结构→区域共同富裕机制→区域共同富裕绩效”

在一国经济由A、B两区域构成的假定中,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意味着两区域的资源配置具有相同层次的效率,经济增长无论是从每一区域看还是从两区域构成的整体上讲,都具有内在的扩张机制。如果把区域经济增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以表示的话,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所体现出来的制度重新安排,会通过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改变该生产函数中的各种参数的输出功能,使区域经济增长能够突破既定的技术水平和投入要素规模的约束,产生出更大的经济增长总量。另一方面,从制度重新安排引起的投入要素流动的角度而言,投入要素在每一区域内部或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足以诱导这些投入要素在每一区域内部或区域间重新组合直至优化组合,同样具有突破既定技术水平和投入要素规模约束的功能。例如,假定区域A生产 X_A 产品(X 代表产品品种及其产量,脚标A代表区域A。下同)具有比较劣势,生产 Y_A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区域B生产 X_B 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生产 Y_B 产品具有比较劣势。在投入要素自由流动过程中,作为对比较利益牵引的理性反应,区域A原来用于生产 X_A 产品的投入要素,一部分会并入本区域 Y_A 产品的生产,另一部分会自动流出,与区域B产品 X_B 的生产进行优化组合。同理,区域B原来用于生产 Y_B 产品的投入要素,一部分会并入本区域 X_B 产品的生产,另一部分也会自动流出,与区域A产品 Y_A 的生产进行优化组合。结果,投入要素将聚集于两区域各自的比较优势产品部门,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增长总量大于两区域分别都生产两种产品时的经济增长总量,即如果令 Y_A^A 、 X_B^B 为两区域分别专门生产比较优势产品时的经济增长总量, $X_A^A + Y_A^A$ 和 $X_B^B + Y_B^B$ 为两区域分别都生产两种产品时的经济增长总量,则 $Y_A^A > X_A^A + Y_A^A$, $X_B^B > X_B^B + Y_B^B$,从而 $Y_A^A + X_B^B > (X_A^A + Y_A^A) + (X_B^B + Y_B^B)$ 。在投入要素的流出流入过程中,两区域中要素的边际报酬均递减,该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必然表现出凸性。

不仅如此,区域经济增长还在增长方式上具有内在的转换性。投入要素具有稀缺性,市场活动的利益主体具有价值上的无限占有性。市场空间一元结构中,各个区域市场的竞争实力处于相同层次的发育水平,为了摆脱投入要素稀缺性的约束,区域利益主体除了选择制度重新安排,促进投入要素优化组合外,对价值无限占有的追求过程,往往还体现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不断转换。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工作日长度等等为既定条件的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过程中,某一利益主体为了谋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设法让自己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为此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并以“超额剩余价值”的形式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超额剩余价值”占有形式的出现,表明这一利益主体占有的“剩余价值”在数量上多于其他利益主体,由此形成对其他利益主体强大的物质刺激力。在这种物质利益驱使下,其他利益主体也会或迟或早地采取相应的技术创新。一旦这些利益主体的技术创新完成,就会形成一个发端于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求,结束于所有的利益主体都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社会整体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周期。“相对剩余价值”占有形式的实现,既是上一个技术创新周期的结束,同时又是下一个技术创新周期的开始。如此循环不已,推动社会整体技术水平不断由一个台阶迈向另一个更高的台阶,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发生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一逻辑,同样适合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分析。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

区域利益主体摆脱投入要素稀缺性制约,占有更多利益,在其他条件既定时,往往还会选择技术创新方式,并由此自觉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不断转换。

区域经济增长不仅在方式上具有内在转换性,而且在动态关系上还具有双赢性。具体而言,(1)资本形成在不同区域是双赢的。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1973)、赫希曼(1958)、斯特里顿(中译本1984)、罗斯托(1963)等都曾探讨过不同区域如何在资本形成上达到双赢的问题。由于他们的理论实际上局限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的框架内,因而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内含着区域两极分化机制,用缪尔达尔的话来讲存在着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程效应的综合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行平衡投资(例如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刘易斯)也罢,按照产业关联度(例如赫希曼)、立足于欲望合成代谢规律(例如斯特里顿)、依据主导产业部门(例如罗斯托)进行不平衡投资也好,资本形成将更有利于发达区域而不是落后区域。但是,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区域间的有效投资需求处于相同的发展层次。区域间相同层次的实际收入水平会形成相同层次的需求弹性,进而具有相同层次的投资引诱及其在此基础上的双赢的资本形成。(2)生产要素的流动在不同区域是双赢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出流入的确取决于要素报酬的高低(或机会成本的大小),但是要素报酬的高低又以既定的区域分工类型为基础,区域分工类型又以市场空间结构的基本类型及其绩效为转移。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区域间的分工不可能是垂直型分工,往往是水平型分工或混合型分工。在水平型或混合型的区域分工格局中,才存在着有利于不同区域共同发展的比较利益,而不是李嘉图(1817)、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1997)笔下的那种更有利于发达区域的比较利益。此时,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自由流出流入,才不致于仅仅是“孔雀东南飞”,而是“飞入寻常百姓家”。(3)产业转移在不同区域是双赢的。现代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主导产业部门的成长过程。主导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通过回顾影响、旁侧影响和前瞻影响表现出来,而且还通过这三种影响的综合作用引导产业部门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来实现。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中,区域间主导产业部门的具体构成“趋异”;发展水平则“趋同”(这与郭万清的见解有所不同,参见郭万清,1992)。具有这种特征的主导产业部门的回顾影响、旁侧影响和前瞻影响的综合作用并非是封闭的,必然伴随着相应的产业部门在区域间相互流动,形成符合各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等要求的“主导部门综合体系”,构成区域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产业结构基础。

由上述分析可见,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命题,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1)区域间具有真正的市场,亦即区域间存在足够的市场,(2)区域间存在着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市场竞争规则行事的基础,和(3)区域间能够达到竞争均衡状态,因而存在区域共同富裕机制,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区域共同富裕绩效,即“市场空间一元结构→区域共同富裕机制→区域共同富裕绩效”。因此,在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条件下,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区域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

(二)市场空间一元结构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所谓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指以西部大开发为切入点,试图以此求得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共同富裕的总体性策划。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结果上讲,是要实现由区域两极分化绩效向区域共同富裕绩效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根据本文的分析,要实现由区域两极分化绩效向区域共同富裕绩效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实现由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向区域共同富裕机制的历史性跨越;要实现由区域两极分化机制向区域共同富裕机制的历史性跨越,必须实现由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向市场空间一元结构的历史性跨越。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在于通过

市场创新,实现由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向市场空间一元结构的历史性跨越。换句话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质在于构建市场空间一元结构。回避市场空间一元结构的构建,试图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条件下去扭转要素报酬东高西低的局面无异于舍本逐末。试图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条件下,通过国家选择恰当的投资领域,使得西部地区获得经济增长速度趋同的机会,充其量只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实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趋同俱乐部的复归。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构建市场空间一元结构有机衔接起来,将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六、小结

(1) 区域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始终。因而,无论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还是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是关于所有区域共同富裕的总体性筹划。

(2)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由于以计划空间结构为实施基础,不仅不可能达到区域共同富裕目标,相反还使所有区域都陷入共同贫困的境地,因而是一种不成功的战略。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由于塑造的是市场空间二元结构并以此作为实施基础,不仅不可能达到区域共同富裕目标,相反却造成了区域两极分化,因而也是一种不成功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由于构建的是市场空间一元结构并以此作为实施基础,完全能够达到区域共同富裕目标,因而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

(3) 区域经济发展三大战略间的替代,反映的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变迁。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替代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反映的是市场化思路替代计划化思路;西部大开发战略替代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反映的是市场创新思路替代市场模仿思路。

参考文献

(上接第 81 页)

参见 Dufey and Giddy,1978: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 Prentice Hall, Ch.2, Foundation of Finance Series; Fisher, International Bond, Ch.1, Euromoney Publications; Marcia Stigum, The Money Market, Ch.6, Dow Jones Irwin,1983; Ravi C. Tennekoon,1991: The Law & Reg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h.1, Butterworth, Hal S. Scott & Philip A. Wellons,1997: International Finance, Ch.1, The Foundation Press; 以及韩龙博士论文《离岸金融的法律问题研究》等等。

《辞海》“监督”条,4423 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毛寿龙:《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总序第 3 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转引自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1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Bill Penman Brown,1996: Offshore Financial Service Handbook, pp.41, Gresham Books。

Roy M. Goods,1987: Concepts of Payment in Relation to Expropriation of Bank Deposi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Feb., pp.82 ~ 83。

J. E. Hoffman,1980: The Iranian Assets Litigation, pp.350, Matthew Bender。

10 E.M.A. Kwaw,1994: The Grey Areas of Eurocurrency Deposits and Placements, pp.346 ~ 348,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1 Hal S. Scott & Philip A. Wellons,1997: International Finance, Transaction, Policy, and Regulation, pp.599 ~ 628, Foundation Press。

12 Compendium of Documents Produced by Basle Committee, 1997: Volume Three, International Supervisory Issues, April 1997, pp.11~ 27。

13 详见该组织首席执行官 Colin Powell 给作者的来信及所提供

1. 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 李普斯:《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载《现代国外经济理论文选》第 8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V. 奥斯特罗姆, D. 菲尼, H. 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王梦奎、李善同等:《中国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徐逢贤等:《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7.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文版,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8.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9. 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思考》,载《经济研究》,2000 (6)。
10. 蔡日方、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载《经济研究》,2000 (10)。
11. 程保平:《地区经济增长的三种理论模式及选择》,载《中国经济问题》,1997 (6)。
12. 程保平:《我国地区经济分工类型的成因及发展趋势研究》,载《中国经济问题》,1999 (5)。
13. Hirschman, Albert Otto,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4. Myrdal, Gunnar,1957: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New York: Harper。
15. Myrdal, Gunnar,1968: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6. Nurkse, Ragnar,1953: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7. Lewis, W. Arthur,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22, May, pp. 139~ 191。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一夫)

资料。

14 本部分系根据 ISMA 向作者提供的资料撰写而成,这些资料主要有: ISMA Statutes, By-law Rules and Recommendation; ISMA Insights; ISMA: The Euromarket, Revised Edition 1996 等。具体出处不再一一注明,在此作者向 ISMA 表示感谢。

15 本部分内容系根据该组织首席执行官 Colin Powell 给作者的来信及所提供资料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给作者的资料写成,具体出处不再一一注明。作者在此特向 C. Powell 先生和巴塞尔委员会致谢。

16 以泽西(Jersey)为例,泽西坚持实施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国际银行业标准,泽西监管当局严格金融机构的准入,对不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拒绝进入,曾两次拒绝后来倒闭的著名的巴林银行建立机构。

17 J. 奥林·戈来比:《国际金融市场》,中文版,52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8 S 条例的出现取代了 4708 号决议,但顺应 4708 号决议所采取的发行机制仍构成适应 S 条例等所采取的现行发行机制的基础,只是适应美国 S 条例规定将原 90 天的锁定期限改为 40 天。采取锁定期限的原因在于美国市场对这类证券发行人发行的证券有重大兴趣,在证券价格波动的高峰期即发行后接下来的期限里离岸市场上所发行的证券流往美国的潜在可能性最大,所以锁定期限旨在通过在此期限内禁止对美国人进行销售阻止证券在这一高峰期流往美国,从而保护美国投资者和美国市场。

19 Peter Krijgsmann: A Brief History, IPMA's Role in Harmonizing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1984-1994, pp.11~ 14。

20 ISMA,1996: The Euromarket, Revised edn, pp.29。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陈永清)